

刘茂辰 刘洪 刘杏编撰

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

前言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生于西晋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东晋升平五年（三六一）去世，享寿五十九岁。历任秘书郎，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吴兴太守，征西参军、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此人称王右军）。

羲之出身于名门大族。从曾祖王祥，官至太保，封睢陵公；『以孝闻天下』。曾祖王览，历任宗正卿、光禄大夫。祖父王正为尚书郎。父亲王旷，曾任侍中、丹杨太守、淮南内史。从祖王裁、王基等都在西晋京都洛阳做官。从伯王敦、王导辅佐东晋元帝在江南立国，一为大将军，一为丞相，执掌军政大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两晋门阀政治格局中，琅邪王氏最为显赫。

整个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腐朽的政权之一。皇帝昏庸，官吏腐败，清谈盛行，战乱频仍，国势衰颓，人民灾难深重。

三国时代，蜀、魏、吴三个王朝末期，河内温县大族司马氏集团勃兴。公元三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司马懿父子大肆屠戮曹魏宗室，攫取了政权；继而又出兵打败了蜀汉。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登基，国号曰『晋』，纪元『泰始』，建都洛阳。公元二八〇年，司马炎又武力征服了孙吴，统一了中国。

司马炎结束了三国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事业，客观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司马氏篡夺政权之手腕的卑劣与残忍，也是史无前例的。后来，司马懿的五代孙晋明帝司马绍时期，羲之从伯王导为丞相，一日，明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导乃陈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残害魏帝曹髦事，羞得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安得长远！』司马氏夺权的卑鄙狠毒行径，使得他们的后代都害羞到没脸见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残杀、夺取政权之伎俩，必然被后世野心家所仿效。所以，晋初统一安定的局面只维持十来年，便出现了宗室八王争夺皇位的长期混战，由此又导致了各少数民族

反晋斗争和后来的十六国割据。著名爱国英雄祖逖说：『晋室之乱，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夷狄乘隙，流毒中土。』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后赵羯族首领石虎得势时谓群下曰：『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故使朕得至此。』内争外侵，严重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国力，经过武、惠、怀、愍四帝五十二年，西晋就灭亡了。

永嘉年间（三〇七—三一三），北方大乱，人民纷纷南逃。公元三一七年，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睿采纳羲之父王旷的创议，到江南建邺，在羲之从伯王敦、王导策划辅佐下，建立了东晋王朝。虽曰『中兴』，而『主弱臣强』，实质是『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政权建立不几年，流亡江南的几大世族之间又明争暗斗起来。他们不想也无力恢复中原，只求偏安江左，苟延残喘。而百姓在统治者残酷盘剥下，『死亡绝没，家户空尽』（羲之《与谢尚疏》）。东晋政权勉强延续一〇二年，终于腐败透顶，被南朝宋刘裕所取代。

羲之生于西晋后期，饱经战乱，深受颠沛流离之苦；长于东晋前半，身处偏安苟延之局，怀抱无所作为之憾。然而，他的高品懿行在当世却是杰出的，众醉独醒的；尤其是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社会大变动、斗争极激烈的时期，却会出现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学术活跃、文艺繁荣的局面。春秋战国如此，魏晋南北朝是如此，近代的『五四』运动前后亦复如此。其原因盖由于政权四分五裂，政治禁锢松弛。作为统治阶级治国经典的儒术虽仍是正统，但日趋式微，意识形态就多样化了。其表现就是，各阶层人士自由活动，各种思想流派竞相问世，多样学术理论在争辩中蓬勃发展，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文学艺术异彩纷呈。当然，新出现的事物并不都是好的，但对立统一的斗争还是推动了历史文化的前进。

两晋时期的情形尤其明显。司马氏政权的极端腐朽，社会的动荡不安，恰好为意识形态的活跃、文学艺术的繁荣造成了条件。例如：郭象、欧阳建等人的哲学，道安、支遁等人的佛学，葛洪、许迈等人的道学，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歌，干宝、张华等人的小说，陈寿、孙盛等人的史学，吕忱、郭璞等人的语言文字学。如果说这些人物及其成就并非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流的，那么，其普遍性却是相当大

的；尤其是顾恺之的绘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确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高峰。

两晋时期，儒学仍在，玄风盛行，佛学方兴，各种思想都在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羲之的思想，有人说是道家（老、庄）思想，有人说是亦儒亦道，有人说是儒释道三者的融合。以上诸说都不无道理，但也有偏颇。根据史料，结合当时的形势以及羲之的言行来分析，他的思想应是以儒家积极用世为主导的，决非儒道对等，更不是儒释道三者合一。

儒学（名教，尊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自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以三纲五常和经国济世的学说，主宰历代政权，主导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儒家知识分子都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特别自汉武帝实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

忠、孝是儒学的核心。晋代君主篡夺曹魏政权，不好言忠，而倡导『以孝治天下』。他们深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字能够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晋武帝一登位，就下令尊崇孔子后裔，弘扬儒教；大树特树王祥这个『孝子』的典型。从羲之《誓墓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也继承了乃祖孝顺父母的传统。在晋代，儒学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实施，像后来的宋、明、清那样，特别是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它的强度有所削弱，但它的主导地位还是存在的，并且延续到后世一千多年。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心、修身，特别是齐家、治国，不用儒家的学说，而靠清谈玄虚、轮回报应是无济于事的。当时的清谈名士刘惔、王濛讥笑宰相何充只是终日埋头处理政事，何充回答说：我不为百姓和国家办些实际事情，你们这些空谈家能够活下去吗！也正因此，羲之的主导思想不能不是、事实上也正是正统的儒家思想，虽然也受到了道教、佛教的某些感染。

羲之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朝廷政事、国家命运，时时刻刻切切关心。他为人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竭力为民请命。例如：

谢安是清谈名士，共登冶城时，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劝导他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里尖锐地批

评了『虚谈』、『浮文』的无聊无益，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任，倡导『宜思自效』的爱国精神。

扬州刺史殷浩聘请羲之任护军将军，他推迁不拜，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他不是不愿为国效力，而是看到朝廷昏暗，『不乐在京师』任职，是想出使外任。他答殷浩书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这些言论充分表明，羲之不仅乐意为国效力，而且简直是急不可待，责任心十分强烈，出仕态度非常积极；与那些不婴世务、超然物外、以谈玄自高、只求个人悠闲自适的风流名士，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殷浩不自量力，刚愎自用，不听羲之的忠告和劝阻，轻率北伐，导致惨败。羲之致书严厉地指责道：『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他建议：『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羲之毫无顾虑地批评最高执政者会稽王、宰相司马昱，指出司马昱处事和古之弘大业者根本不能比拟，『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殫尽，万不馀一……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不亡何待？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藪而已。』司马昱沉溺清谈，昏于政事，羲之则劝谏其『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然而他的批评和建议一概不被采纳，为此，羲之非常愤慨，在致友人谢尚书中云：『吾于时（指当时的执政者）疏地（位）卑，致言诚不易。然太老子（以愤激的口吻指自己）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人之至诚，故当有所回（指当政者回心转意），不尔，坐视死亡耳！』羲之如此关心国家命运，骨鲠在喉则直率倾吐，这与那些依阿无心、惟求自全，甚至苟媚取容的谈玄名士相比，品格之高下，当何如耶？

其时，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民不堪命。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解救百姓于水火。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使他『对之丧气，罔知所措』，忧心忡忡地慨叹道：『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恐胜、广（指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之忧，无复日

矣！』这不仅是对当政者的严重警告，也体现了羲之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循吏』精神。那些锦衣玉食却专以谈玄为务的道学家们，谁人关心过百姓的死活呢？

宋代洪迈对羲之的遭际曾感慨良深地说：『逸少盖温峤、蔡谟、谢安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一无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宏卓，当世亦少其比。』（《容斋随笔》）洪迈的评价是确实。实际上，羲之的『清真鉴裁』能力还在温、蔡、谢之上，虽然官职没有他们那么高。

当然，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个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都不可能是一一的，纯而又纯的。两晋时代，除了主导意识儒家名教以外，道家思想在羲之的头脑里也占有一定地位。『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羲之也未能免俗。他和友人的通信中有不少『涉道』的内容。主要是修黄、老之术，服食养生。他长期服食寒食散，以求长生久视。但是，反而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疾病经年缠身，无一日不『勿勿』、『愤愤』。残酷的事实促使他逐渐有所觉醒。例如，他曾一再感叹：『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指长寿、成仙），此或速弊！』他的至亲好友许询（字玄度）笃行道法，反而早早病死了。羲之写信哀悼说：『痛念玄度！立如志（立下如此笃信、力行道教的心愿），而更速祸，可惋可痛！』羲之信道，但在事实教育下，晚年有所悔悟。

有人认为道家思想比儒家似乎进步些。否。儒家思想存有许多糟粕，是应该剔除的；但是，它在治国理政方面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直到现在也还是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学说特别是魏晋玄学，清谈浮虚对锻炼人们的思辩能力或许有点作用，但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许多人说，东晋中期名士们的最大特点是那种仙风道骨、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实际上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其中不少人利欲熏心，虚伪矫情。羲之其人品包括他的书法艺术都具有潇洒飘逸的特点。《世说·容止》云：『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晋书·王羲之传》亦以后八个字称颂其『笔势』。书如其人，是一致的。不过，羲之并不终日飘在空中，他的人生观是积极入世的，他对书体的改革和创新也是为世所用的；延续到今天书法界仍然受其泽惠。《世说·赏誉》引《文章志》云：『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这是说羲之的品格、风度比当时一般的所谓名士要高超得多。

有一种误会：凡悠游山水、热爱自然者都是道家、名士。这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之见。羲之晚年

也曾如此做，但却不能命名其为『道家』、『名士』。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还赞许弟子之志：『浴乎沂，风乎舞雩』。可见儒者并非个个都是一段稿木。羲之悠游山水时曾有一句话：『我卒当以乐死！』实际上他的『乐』非常有限。倒是《世说·仇隙》说得深刻：羲之『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这话颇中肯綮。他生不逢时，积极用世不成，又回天无力，不得不消极避世。『以忿慨致终』，成了悲剧角色，何『乐』可言？

多年来，学术界有人把老、庄思想混为一谈，说羲之是『老庄思想』。认真分析，老和庄有同有异。两家都以『无为』作最高宗旨。但是，老子的『无为』目的在于『无不为』，是积极用世的态度，其中还有朴素辩证法的成分。庄子的『无为』是一切虚无，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是消极的东西。诚如史学界所论，老、庄之争带来了玄谈的盛行，但老和庄不是一码事。羲之在其《誓墓文》中云：『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晋书·郗愔传》也说郗愔和姊夫王羲之『修黄老之术』。相反地，羲之在《兰亭序》里直斥庄子『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在另一书信中还贬庄子『殊诞漫如下言』。上述事例充分证明羲之思想是崇老的，对庄则不无微词。

除此之外，羲之思想还受到佛教的某些影响。

《世说·文学》记载一则故事：『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隼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支遁是东晋著名的佛学大师。他在这里是以佛解庄。本来《逍遥游》是非常难懂的。当时有郭象、向秀的解释，但『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遁以佛学的『色空』理论，补充了『向、郭之所未尽』。（详见《世说·文学》刘孝标注）因此，大家都感到『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来形成了一种『支理』，为名贤所接受。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就表示愉快地信服了『支理』。

羲之曾与沙门支遁等佛徒游处，并且也浏览过一些佛教经典，在一封书信中对朋友的信佛有所肯定，

还谈到自己『欲穷「本无论」，并且有了「小进」。说明他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当然还不能说是他思想的主导或主流。

由于家学渊源深厚，艺术天赋独高，加以勤奋好学，羲之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历来被尊崇为『书圣』。他和他的小儿子献之，继承和发扬了汉魏张芝、钟繇的优秀传统，改革了书体，彻底克服了汉代隶书那种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不便书写的局限，创造性地发展为妍美流便的楷书、行书、草书。不仅如此，他们还促使书法艺术达到了一次新的飞跃，就是由汉末只注重文字的结构形体之美，升华到创造书法作品意味无穷的『神韵』，以表达书家风流儒雅、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晋书尚韵』，成为后世许多书法家孜孜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羲之亲手书写的墨迹，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唐人摹拓的《丧乱》、《二谢》、《得示》、《哀祸》、《孔侍中》、《姨母》、《奉桔》、《寒切》、《快雪》、《兰亭》等十馀帖保存到现在。它们虽经摹拓，仍很逼真，只『下真迹一等』，故从而还能看到羲之书法艺术的大体风神。

献之的书法改革步子较之乃父更大些，骨力有所不及，而颇有媚趣。其书迹流传至今的有：《中秋》、《送梨》、《鸭头丸》、《地黄汤》、《洛神赋》等数帖。据专家鉴定，也不能肯定就是手迹。

齐梁时琅邪临沂人颜之推曾评论说：『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书）自蔽也。』（《颜氏家训·杂艺》）颜氏和洪迈一样，慨叹羲之为书名所掩，在仕途上无大成就。其实大可不必。一个人，能如羲之父子在书法艺术上达到百代流芳的高度，也就不虚此生了。古往今来，达官显贵何止万千？能像羲、献这样被人崇敬、效法的，竟有几何？

二王的诗文、法书，在羲、献当代就已享有盛名，被人加以宝藏（例如桓玄等）。到宋、齐、梁、陈、隋、唐，重视并收藏二王作品，就蔚然成风了。但编辑成集的，最早要数初唐褚遂良（五九六—六五八）。他在贞观十三年（六三九）辑录有《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唐太宗李世民绝爱羲之法书，不惜重金搜购天下王氏遗迹数千百卷，命人加以鉴别、整理、装裱，藏于御府之中。褚氏在此基础上编成《书目》，著录羲之正书（正楷）五卷，四十帖；行书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可是有目无文，令人惋惜。

晚唐乾符年间，张彦远辑录的《法书要录》，规模较大。第一卷收有《晋王羲之论书》、《王羲之教子

敬笔论》(有目无文)、《王羲之题笔阵图后》,三题二文。第十卷《右军书记》收羲之帖文四百六十五通,王献之帖文十六通。《要录》比褚目保存了更多的原作,弥足珍贵。

宋太宗命侍御史、书法家王著于淳化三年(九九二)编次内府所藏历代书迹,摹刻成《淳化秘阁法帖》十卷,大半是二王书帖。后来又有朱长文的《墨池编》、陈思的《书苑菁华》,这些著作都是从书法角度纂辑的。其中都有二王专卷。

明代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有《王右军集》和《王大令集》,内容不很完备,但编排比前人有所进步。

清代严可均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晋文》二十二至二十七卷收录二王的大部分作品,可谓集成之作。但是,严氏没有加以分门别类,也很少进行校勘、考证,更缺乏诠释。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致力于二王的研究。对他们的政论、散文、诗歌、书信、书帖作了尽可能全面的搜集、整理、校勘和笺释,撰成这本《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对二王的学术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附录《二王生平系年》部分,较之清代鲁一同的《王右军年谱》(以下简称《鲁谱》)和近人麦华三的《王羲之年谱》(以下简称《麦谱》)更为详赡。对他们的某些不足或欠妥之处,也作了许多补正。其中王献之部分则基本上是新的创作。

本书所用的史料,大多引自中华书局版《晋书》和《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两种书内容比较规范,也比较常见。为节省篇幅,除了十分必要,一般不一一注明出处。其他较为稀见的材料,则说明来源。

本书重点在《笺证》,即以笺释语义和考证史实为主。结合着,也对某些重要字句进行比较。但对各种版本的一般文字的异同,不单出校文。

本书撰稿期间，承蒙辛鸿义、王瑞功、丁荣凡、张霭堂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意。十分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先生对本书出版事宜给予的精心指导和鼎力支持。

王羲之名言云：『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本书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补正了前人的某些失误，但自己的缺点纰缪也必定会有；敬请读者给予指正。

一九九〇年初稿

一九九四年修订

一九九七年改定

刘茂辰于王羲之故里琅邪临沂
临沂师范学院

目录

第一卷 王羲之著作

一 政论

(一) 报殷浩书：愿供驱使宣国家威德	三
(二) 临护军教	四
(三) 与殷浩书：劝令画廉、蔺于屏风	四
(四) 上司马昱书：议经国达治之道	五
(五) 致殷浩书：建议与民更始	五
(六) 上司马昱笺：论退军保淮	七
(七) 致谢尚疏：力陈时弊为民请命	九
(八) 与谢万书：述为逸民之乐	十
(九) 与桓温笺：说谢万不胜北伐重任	十一
(十) 致谢万书：劝勉与士卒同甘苦	十二

二 散文、诗歌

(一) 兰亭集序	十三
(二) 誓墓文	十五
(三) 游四郡记	十六
(四) 赞蜀中山水	十七

三 书信

(五) 兰亭诗(二首)	十七
(六) 答许掾诗(二首)	二十
(七) 月仪书	二十一
(八) 鼓山题辞	二十一

四 书学理论

(一) 关乎帝王将相者	二十四
(二) 关乎会稽为政者	三十八
(三) 关乎自家人者	四十九
(四) 关乎近族人者	五十八
(五) 关乎二郗者	六十七
(六) 关乎二谢者	七十六
(七) 关乎友朋问候者	八十九
(八) 关乎亲戚往来者	一一二
(九) 关乎服食、信教者	一一九
(十) 关乎自身疾病者	一二七
(十一) 关乎丧葬吊唁者	一三二
(十二) 晋右军王羲之书目	一四一
〔附〕王虞书信二通	一四七

(一) 自论书	一四八
---------	-----

(二)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一四九
〔附〕 晋卫夫人《笔阵图》	一五〇
(三) 书论	一五二
(四) 笔势论(十章)	一五三
(五) 笔势论十二章(并序)	一五五
(六) 草书势	一六〇
(七) 用笔赋	一六一
(八) 天台紫真传授笔法	一六一
(九) 笔经	一六二
〔附〕	
(一) 王羲之书事编年	一六三
(二) 历代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论	一七五

第二卷 王献之著作

一 政论	一七九
(一) 辞尚书令与州将书	一七九
(二) 为中书令、启琅邪王为中书监表	一八〇
(三) 陈明谢安功勋疏	一八〇
二 散文、诗歌	一八二
(一) 赞会稽山水	一八二
(二) 乞假表	一八二
(三) 进书诀表	一八二

(四) 保母志	一八三
(五) 桃叶歌	一八四
三 书信	一八五
(一) 关乎妻郗道茂者	一八五
(二) 关乎自家人者	一八六
(三) 关乎亲友者	一九四
〔附〕	
(一) 献之诸兄书帖	二〇一
王凝之：八月帖	二〇一
王涣之：二嫂帖	二〇一
王徽之：得信帖	二〇一
王徽之：新月帖	二〇一
王操之：年光帖	二〇二
(二) 历代对王献之书法的评论	二〇二
附录一 二王生平系年	二〇五
〔附〕	
(一) 王羲之、王献之生平简表	二七七
(二) 王羲之父兄考述	二八四
(三) 王羲之子孙考索	二八八
(四) 王、谢家族人员表	二九二
(五) 晋书·王羲之传	二九五

附录二	二王法帖	二九九
(一)	说明	三〇一
(二)	王羲之帖	三〇三
(三)	王献之帖	五五六

第一卷 王羲之著作

一 政 论

(一) 报殷浩书：愿供驱使宣国家威德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①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②，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③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④，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⑤，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⑥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笺证】

此文录自《晋书·王羲之传》。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以下各篇同此。

本文作于永和三至四年（三四七—三四八）间。本传云：「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遣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

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

《通鉴》卷九十八记载，羲之人朝任护军将军在永和四年八月。此前，永和二年三月，褚裒荐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七月，浩始就职秉政。估计殷浩劝羲之出仕的这封信，当写于永和三四年间。从信中「出处」、「从容之适」等词语，可见羲之此时正在「处」而未「出」，从容适于「草泽」，即赋闲（具体原因见《二王生平系年》）。殷浩（三〇五—三五六）：字渊源，陈郡长平人。咸和至咸康年间，在征西将军庾亮幕中与羲之共事，素雅重羲之。

①王丞相：指王羲之从伯王导（二七六—三三九）。咸康四年（三三八）六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太傅王导为之。次年七月王导卒。大概王导死前有引荐羲之人朝做官的拟议，羲之没有从命。其中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怨，而是由于「素自无廊庙志」，更由于当时朝廷腐败，执政「愤愤」。羲之为人「以骨鲠称」，「清贵（一作真）有鉴裁」，「不乐在京师」，即不肯同流合污，故「誓不许之」。

②尚子平之志：即「为逸民」之志。尚，应作「向」。《后汉书·逸民传》：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王莽时向长潜隐于家，读《老》、《易》，坚不出仕。后来，子女娶嫁既毕，乃辞家与同好俱游名山五岳，不知所终。羲之常慕其行为。

③关陇、巴蜀：指今陕甘、四川一带。

④专对之能：指在朝廷上备顾问、应对的才能。

⑤无外：指全国特别是边远广大地域。

⑥马日碑：东汉人，字翁叔，著名学者马融族子。有才学，历位九卿。献帝初为太傅。曾奉使山东，至于淮南。

（二）临护军教

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①。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癯^②，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③。

【笺证】

此文录自《全晋文》卷二十二。《太平御览》二百四十。

永和四年（三四八）八月，扬州刺史殷浩擢羲之为护军将军。此《教》当作于上任之初。

护军：据《晋书·职官志》：魏初置护军将军，主管武官选拔。晋元帝永昌元年（三二二）并护军于领军。晋明帝太宁二年（三二四）复置领军、护军，各领营兵。受命出征则置参军。按：护军为四品军职。

「教」，是一种公文体裁。汉代蔡邕《独断》：「诸侯言曰『教』。」《文选》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题》：「秦法，诸公王（之言）称『教』。教者，教示于人也。」

①公役均平：即待遇合理，差役人人平等。王羲之在致谢万书中还主张「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其关心下属疾苦的宽厚情怀，在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吏中实不多见。

②老落笃癯：指老弱羸疾之人。

③参详其宜：向上官陈报，作适当处理。

（三）与殷浩书：劝令画廉、蔺于屏风

下官^①乃劝令画廉、蔺^②于屏风。

【笺证】

此文录自《全晋文》卷二十二。似是残笺。

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司马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此与桓温渐相疑贰。四年八月，殷浩以征北长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对抗桓温。「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温构隙；浩不从」。

「下官乃劝令画廉、蔺于屏风」这个片段，盖作于羲之任护军之后不久。虽是残笺却极重要。因为将相不和，关系到国家之安危。原来的全文，当更能体现羲之顾大局识大体的高风亮节。

此后，殷、桓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永和七年（三五二），尚书左丞孔严又上言殷浩：「深思廉、蔺屈身之义……令穆然无间，然后可以保大定功也。」可是，殷浩仍然「不从」。既然忠言嘉谋弃而莫用，国事也就可知了。

①下官：羲之自称。时在朝任护军将军。

②廉、蔺：廉颇和蔺相如。廉颇，战国时期赵国的良将，屡立战功，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初为赵国宦者令缪贤舍人。在强秦威胁利诱下，奉璧使秦，挫败秦王阴谋，完璧归赵。又在渑池之会上，秦王对赵王进行污辱时，能针锋相对，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声言「见相如，必辱之！」相如不与计较，处处回避之。别人不理解，相如